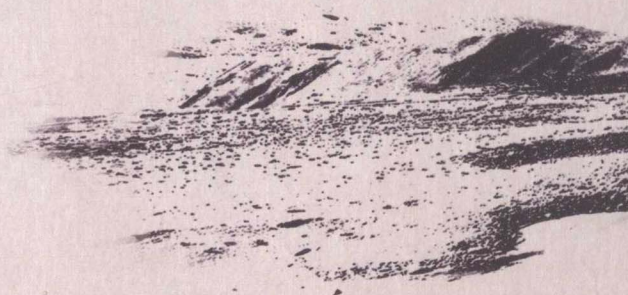


几十年来，我在这里辛勤耕耘，即使在我处境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一天懈怠。心血浇出花朵，耕耘带来收获，这收获虽然不言丰硕，毕竟为中国史学大仓储添加了一粒米、两颗粟。这也是一种幸运。

近代中外关系文集

张振鹗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近代中外关系文集

张振鹗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近代中外关系文集 / 张振鹂著. —北京: 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 2011. 12

ISBN 978 - 7 - 5097 - 2771 - 3

I. ①近… II. ①张… III. ①中外关系 - 国际关系
史 - 近代 - 文集 IV. ①D8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06462 号

近代中外关系文集

著 者 / 张振鹂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近代史编辑室 (010) 59367256 责任编辑 / 吴 超

电子信箱 / jxd@ssap.cn

责任校对 / 李海云

项目统筹 / 徐思彦

责任印制 / 岳 阳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31

版 次 /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字 数 / 520 千字

印 次 /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2771 - 3

定 价 / 8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自序

上世纪末的一天，经济所一位同龄朋友传达给我一个关于出版的信息：院里要为一些老研究员出版文选，先在经济所实施（他本人是其中之一），其他所从80岁以上者出起，渐次向下推展。随后在近代史所也听到类似的说法。这个信息触动了我，我直觉到也许有一天会轮到我由此出一本集子，于是开始有所期待。平时很少过问我的工作的老伴张家光得悉此事，也关心起来，认为我应该出个集子，便和我一起期待。就在这时，2000年4月25日她突发脑卒中，卧床22个月后长辞人世。我的心一下子凉了。出版集子的事完全淡然了，什么期待也没有了，什么也不想了。这期间，近代史所的人好像只有刘大年由院里出了一本文选，没有向其他人推展，因此，事实上也无可期待，无需多想了。

没有料到另有人在为我着想，一直记挂此事，这就是我当年的两个门生高士华、杜继东（承骏）。两人上世纪80年代先后进入社科院研究生院，投在我的门下；毕业后都留所工作，同在中外关系史研究室，成为同事。后来士华去了日本，获得东京大学博士学位，在仙台的大学任教，至今已过十年。他对近代史所感情甚深，每次回国必回所。我们之间保有持久的深厚友谊。继东在所里工作，相互交往更为密切。他的工作岗位屡有变动，去年担任了科研处长。今年元旦后第三天，士华特来告诉我，他和继东正在为我争取出一本集子，他找了有关部门的领导，都表示愿意给予支持，提供帮助。过了两天，继东来，接着士华的话题，向我介绍了一些情况，随即启动编集子的进程，要我立即选录文稿，他也帮我辑录。

突然闻知这一切，我感到一大惊喜，一下子重新燃起了出版集子的希望，不必再期待，希望即可成真。油然而生出一种曾经为师的欣慰和对两位曾经的弟子的感激之情。

选录文稿进展顺利。继东之外，又得到两位年轻朋友张志勇、徐志民的热心帮助，我同样心存感激。

文集编成了，出版有期，谨向其支持、资助者及有关人士诚表谢忱。

文集选录了大小文章 40 篇，有些情况需要作一点说明。

全部文章除两篇外，都曾公开发表。这些文章在收入本集时，除改正原来印刷中的错漏外，原则上都保持原文原貌，但有几篇略有改动。一篇《论不平等条约》在一个注释中加了一条材料；一篇《中法战争》有几处补充了几句话；另有四篇即《刘永福与中法战争——纪念纸桥之役一百年》、《“中国和拉丁美洲关系简史”：有关‘立约建交’若干问题的商榷》、《学术勇气漫谈》、《毕生的幸运——近代史所一甲子简记》，原来发表时曾被删节（其中第 4 篇的删节曾征得我的同意），现据原稿恢复了原貌，恢复了各文的真实与完整。

两篇未发表过的文章，一篇是《赫德与北洋海军：购买军舰》。此文原定写三个问题，“购买军舰”是第一个。写完这个问题，篇幅已不小，便作为独立的文章提交一个学术研讨会。会后据说要出版论文集，但至今尚未出版。现收入本集，应属第一次公开发表。另一篇《论“黄祸论”》，是我编《“黄祸论”历史资料选辑》的总结，写成于 1980 年，曾投给北京一家史学刊物。据该刊编辑严四光几次写信和当面相告，他们最初想发表，最后放弃了，原因是有人认为“黄祸论”这个题目有“政治敏感性”，这样的文章会引起各种猜测和议论。这样一来，文稿只好收入屈中冷藏起来了。现在三十年过去了，那个本来就含义模糊的“政治敏感性”应该不存在了，论“黄祸论”的文章应该可见天日了。所以检出这篇旧作，仔细检阅，酌加修改，收入本集。近年来，海外频频传出“中国威胁论”。如果追溯一下历史，就可以看到，“黄祸论”就是“中国威胁论”的早期版本。“黄祸论”很值得研究，愿此文的发表能对此有所促进。

2011 年 8 月 11 日

近代中国与世界：几个有关问题的考察·····	1
论不平等条约	
——兼析《中外旧约章汇编》·····	20
论“黄祸论”·····	36
清代中国与邻国传统关系的一个标本：中国与越南关系·····	72
中国近代史开端与近代中外关系·····	84
鸦片战争与鸦片问题·····	97
清末十年间中外关系史的几个问题·····	109
清末十年间的币制问题·····	123
辛亥革命与中国海关	
——海关税款保管权的转移及其意义·····	151
试论晚清直隶总督参与外交·····	178
近代中国的边患与边界问题	
——一个简要的回顾·····	185
近代史上中英滇缅边界“南段未定界”问题·····	196
赫德与北洋海军：购买军舰·····	208
近代日本对华关系的特点·····	231

关于中国在台湾主权的一场严重斗争	
——1874 年日本侵犯台湾之役再探讨	247
中日甲午战争与东亚	265
从“九一八”、“一·二八”到“七七”、“八一三”	278
日本侵华与昭和天皇的独白	294
日本与汪精卫	305
抗日战争中沦陷区青年学生投奔大后方初探	319
抗日战争的胜利与日本侵华 70 年历史的终结	327
抗日战争：八年还是十四年？	332
中法战争	338
刘永福与中法战争	
——纪念纸桥之战一百年	349
刘铭传台湾抗法斗争散论	362
中法战争中福禄诺节略“涂抹”疑案：法国资料解读	369
辛亥革命期间的孙中山与法国	374
辛亥革命期间的孙中山与法国（续篇）	391
学术勇气漫谈	400
关于基础资料的一点私见	404
书评的功能	408
介绍《亨利·絮贝尔旅华散记》	
——兼谈发掘国外史料问题	410
《中国和拉丁美洲关系简史》：有关“立约建交”若干问题的商榷	417
历史传说与历史研究	
——《揭开港澳历史之谜》书后	425
“二十一条”不是条约	
——评《中国近代不平等条约选编与介绍》	430
再说“二十一条”不是条约	
——答郑则民先生	436

不要再说抗战胜利是“惨胜”了	448
淞沪抗战：中国的主动进攻与日军主要作战方向的改变 ——评军科院《中国抗日战争史》有关“淞沪会战”的论断	451
拙劣的诡辩 ——评黄文雄著《日中战争——“中国八年抗战”掩蔽的真相》 ...	455
毕生的幸运 ——近代史所一甲子简记	465
发表文章目录	479
后 记	483

近代中国与世界：几个 有关问题的考察

近代中国（1840～1949）与古代中国相区别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中国与世界发生了广泛的联系。这种联系日益紧密，以至达到了不可分离的地步：中国成了全球性国际社会的一员，成了世界中的中国。

这不是说近代以前中国与外部世界没有联系。中国与外国、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很早就已有多方面的交通往来。但这种交往是零星的、偶然的或暂时的，缺乏经常性、连续性或继承性，特别在与亚洲以外的国家的关系上更是如此。

这也不是说近代以前中国一直置身于国际社会之外。早在清朝以前，中国就已同朝鲜、越南、琉球等许多邻近国家建立了一种所谓宗藩关系，并从而形成了一个国际社会。这种关系的主要特点是，这些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接受中国皇帝的册封，并定期向中国皇帝朝贡；集这些宗藩关系之和而结成的这个国际社会的主要特点是，各国分别同中国发生直接关系，它们相互之间很少有什么关系。这实际上是以中国为中心、由四周的国家辐辏而构成的一个国际关系体系。它所覆盖的空间范围相当辽阔，但从全球的观点来看，终究只是以亚洲东部为主的一隅：中国只是一个地区性国际社会的成员。

中国成为全球性国际社会的一个成员是近代的事，中国进入近代的起点是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

一 世界进入中国与中国进入世界

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上看，鸦片战争的一个重要后果是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开始正式建立起国家间的关系。

鸦片战争前，中国同任何欧美国家都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从来不曾

正式建交。诚然，包括俄、英在内的好几个欧洲国家曾派使来华，俄国还同中国打过仗（雅克萨之战）、缔结过条约（《尼布楚条约》、《恰克图条约》）。但这些国与国之间短暂的交接或冲突都已成为过去，现实中可经常出入中国或留在中国国土上的只是一些以私人身份从事活动的外国人：无论是北京的俄国东正教士，或者是广州的英美等国商人，都不是各自国家的官方代表。美国从 1786 年开始在广州委派领事（由商人兼任），英国于 1833 年设置驻华商务监督，但清政府从不承认他们的官方地位。这就是说，清政府允许外国人在中国的一些地方从事一些活动，但不与外国政府或代表那些政府的官员打交道，不同外国发生国家关系，因而那些国家在中国起不了什么作用。

鸦片战争及其结局改变了这一切。战争是在中英两国之间进行的。结束战争的《南京条约》是两国之间签订的。这就表明，当英国破坏中国的禁烟运动、发动侵华战争、进而逼签和约时，就已迫使清政府不得不与它打交道。如果说这还只是一时的，那么，条约中的许多规定则硬性确定了双方之间久远的国家关系。在这方面主要有以下几条^①：

第 1 条：“嗣后大清大皇帝、大英国君主永存平和，所属华英人民彼此友睦，各住他国者必受该国保佑身家全安”。据此，中英两国人民“各住他国”并“受该国保佑身家全安”成为一种“条约权利”。因此，英国人来中国不再是中国可允许可不允许的事，而成了必须允许的事。

第 11 条：“议定英国住中国之总管大员，与大清大臣无论京内京外者，有文书来往，用照会字样；英国属员，用申陈字样；大臣批复，用札行字样；两国属员往来，必当平行照会”。据此，中国政府官员，无论中央的或地方的，都必须同英国派到中国来的政府官员即它“住中国之总管大员”及其属员打交道，而且按照官阶的高低，须依一定的格式及礼制进行文书来往。

第 2 条：“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国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往该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与各该地方官公文往来”。据此，中国须向英国开放五口通商，并在五口接受英国常驻领事。五口中有四口为新开，广州为旧有；但依照《南京条约》的规定而开

^①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 1 册，三联书店，1957，第 30～32 页。

放的广州与前此作为中国唯一对外贸易窗口的广州是不同的。前此广州开放通商完全是中国自己决定的，可以开，也可以关，一切自主；此后则不由自己，只能开，不能关了。前此中国地方官对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可以不予承认，不与往来；此后则必须与英国驻广州领事正式打交道，不能拒绝了。其他新开四口的情况也是这样。不论开放口岸或设立领事，《南京条约》所涉及的中英两国的权利、义务都是片面的：只有中国为英国人开放口岸，而没有英国为中国人开放口岸；只有英国在中国的五口派驻领事，而没有中国在英国的任何地方设置领事。由此看来，《南京条约》不仅在中国对英割地、赔款、与英国协定关税等方面，而且在开口及设领上也表现了不对等即不平等性。

就这样，英国以一场侵略战争强迫中国与它签订了一个不平等条约。这个条约为它的代表及人民进入中国做了明确的规定，创立了它的代表在中国执行公务、中国官方必须与之往来的机制，从而使两国间正式建立了关系。《南京条约》是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英国成为第一个根据不平等条约进入中国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中国的大门首先被英国打开，不是偶然的。英国是当时世界上资本主义生产最先进的国家。作为这个“世界工厂”主人的英国资产阶级，迫切要求开拓海外市场。于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文明古国中国便成为他们觊觎的目标。于是，代表他们利益的英国政府便为实现他们的愿望而对中国大动干戈。所以归根结底，英国进入中国是为了占有中国市场。这个潜在市场对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巨大的吸引力。英国先行了一步，对其他国家起了开路的作用，它们也纷纷前来。清政府既对英国开了大门，便以“一视同仁”的态度对待其他后来者，^①于是1844年7月中美签订《望厦条约》，10月中法签订《黄埔条约》，1847年3月中国与瑞典—挪威签订《五口通商章程》，美国、法国和瑞典—挪威都分别从中取得前述英国从《南京条约》中所得到的权利。然而，这里并不单纯是中英条约内容的重复，还有所发展。《望厦条约》第31条规定：

① 中英谈判《南京条约》时，已预见到其他西方国家将继英国之后而来中国，双方已就此取得谅解。1843年10月的《虎门条约》第8条述及此事：“向来各外国商人止准在广州一港口贸易，上年在江宁曾经议明，如蒙大皇帝恩准西洋各外国商人一体赴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四港口贸易，英国毫无靳惜。”（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36页）由此导致了片面最惠国待遇条款。

合众国日后若有国书递达中国朝廷者，应由中国办理外国事务之钦差大臣或两广、闽浙、两江总督等大臣将原书代奏。^①

《黄埔条约》第34款规定：

将来大法兰西皇上若有国书送达朝廷，该驻口领事官应将国书送与五口及外事务大臣，如无五口大臣，即送与总督，代为进呈。其有国书复转，亦一体照行。^②

这些条约规定国书递送朝廷和复转的途径，表明这些国家亟欲将国交提升到与北京朝廷直接往来。

随着英、美、法等国与中国订立条约，中国于1843~1844年相继开放五口。英国很快就任命了驻五口的领事，美、法都有选择地首先在一部分口岸派设了领事。这三国还向中国派遣了使节。这样，它们进入中国就从条约上的规定变成了现实。从不能进入到实现进入，这是它们对华关系上的一个质的飞跃。路既已打开，它们便要将这条路拓长拓宽。很快，它们就对不能进入北京、不能与中央政府打交道深为不满，它们要改变基本上是在五口范围内和领事级别上进入中国的状况。这些以及其他许多不满由英法联合向中国发动的又一场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得到解决。根据这场战争中所缔结的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和结束战争的《北京条约》，中国应增开牛庄（营口）、天津、登州（烟台）、台南、淡水、潮州（汕头）、琼州（海口）等七个沿海口岸和镇江、南京、九江、汉口等四个沿长江的口岸，还规定外国使节可常驻中国首都。中英《天津条约》是这样写的：

大清皇帝、大英君主意存睦好不绝，约定各照大邦和好常规，亦可任意交派秉权大员，分诣大清、大英两国京师。（第二款）

大英钦差各等大员及各眷属可在京师或长行居住，或能随时往来，总候奉本国谕旨遵行。（第三款）^③

①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56页。中国与瑞典—挪威1847年条约第31条与此相同，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77页。

②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64页。

③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96页。中法《天津条约》第二款内容与此相同，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104页。

这些规定极大地扩展了英法两国进入中国的范围，提高了其级别。美国也与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并根据在华片面最惠国待遇的原则，“一体均沾”了英、法条约中的一切利权。

与英、法、美等国从海疆进入中国同时，俄国也在大步从陆路边疆进来。1851年8月中俄签订《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俄国单方面取得在中国这两地设领事“照管”贸易的权利。1858年5月，当英法联军正在天津附近进行侵略时，俄国在黑龙江以武力威胁，逼清朝当局签订《璦琿条约》；俄国代表还狡诈地利用第二次鸦片战争，与清政府订立《天津条约》、《北京条约》。根据这些条约，俄国在中国东北割去大面积的土地，在西北扩大陆路通商，设立领事地点增加喀什噶尔、库伦两处，此外还取得英、法、美在华所得的许多权利，从而与这三国并驾齐驱而有余了。

从1861年起，新增通商口岸陆续开放，法、英、俄、美四国驻华公使相继进入北京，由此开始了外国使节常驻中国首都的历史。公使是当时以及以后六七十年间外国驻华的最高外交代表。如果说前此在40年代，英、美、法派领事驻扎于中国东南半壁沿海五口还是开始与中国建立国家关系、初步进入中国，那么此时从60年代起中国沿海、沿边、沿江各地广泛开放，以英、法、美、俄四国公使驻京从而确立与中国中央政府打交道的机制为标志，可以说它们在对华国交上完全进入中国了。

公使常驻京师是外国资本主义对华关系的新突破。这不但为这四国本身彻底打开了在华外交渠道，也为更多的国家进入中国廓清了道路。此后几年间，世界各地许多国家派使来华议约建交，清政府再也阻挡不住，而且也无法拒绝了。1861年9月中国、普鲁士（德国）签订《和好贸易船只事宜和约章程》，1863年7月中国、丹麦签订《天津条约》，10月中国、荷兰签订《天津条约》，1864年10月中国、西班牙签订《和好贸易条约》，1865年11月中国、比利时签订《通商条约》，1866年10月中国、意大利签订《通商条约》，1869年9月中国、奥地利（奥匈帝国）签订《通商条约》，1871年9月中国、日本签订《修好条规》，1874年6月中国、秘鲁签订《通商条约》。由此，中国同这些国家正式建立关系，这些国家也陆续派遣公使驻扎中国。这样一来，进入中国的不但有欧洲的大部分国家，也有亚洲、北美洲、南美洲的国家。因此，在鸦片战争过去三十多年之后，可以说世界基本上进入中国了。

世界进入中国，使中国进入世界成为不可避免。可以说，当英国开始进入中国时，中国也已开始进入英国，不过那还是通过英国的“反射”，是一种消极意义上的“进入”。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前，清朝统治者中做梦也没有人想到过，应派自己的代表走出国门，积极地到派代表来中国的国家中去，因而国交虽已建立，却是单方面的有来无往。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为适应中外关系新形势的需要，清政府设立了与外国打交道的专门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外国人不断劝告清政府向外派遣使节，清政府也逐渐感觉到此种需要——需要有人现地了解外界情况，处理实际问题（如出国华工问题等），或与外国政府直接办理某些交涉；但由于他们在思想上、心理上以及体制上都还有许多根深蒂固的障碍难以克服，因而举步维艰。1866年总理衙门派章京斌椿等随总税务司赫德赴欧洲考察，1868年以卸任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为“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由志刚等陪同赴欧美各国活动，都表现了清政府欲行又止，但毕竟是一种起步。中国官员第一次正式出使西方，是崇厚因1870年的天津教案而赴法“致歉”。这表明，在外国对华关系不断扩大的形势下，中国即使还能拖延正常的出使，扭曲的出使还是无法抗拒。在此以前中国海关已在伦敦设立办事处，事情的主持者虽是外国人，机构本身则是中国的。1871年清政府批准派幼童赴美留学。1873年中国第一次以土特产到维也纳国际博览会上展出。这一切都反映出走向世界、直接与外界接触交流已成为大势所趋。连年来，外国驻华公使不断增加，清政府对此逐渐习以为常，因而向国外派遣常驻使节的条件日臻成熟。1875年任命郭嵩焘为驻英公使，次年到任；任命陈兰彬为驻美国兼驻西班牙、秘鲁公使。第一步既已迈出，以后的步子就比较容易了。1876年任命驻日本公使。1877年任命驻德国公使。1878年任命驻法国公使（由驻英公使兼任）及驻俄国公使。这几年间，还向这些国家或其属地的一些地方派驻了领事。这样就结束了只在中国领土上接受外国使领、而没有中国代表常驻外国领土的历史。中外国交从单向而发展为双向，相互间完全的国家关系于兹建立，中国基本上进入了以欧洲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

世界进入中国，中国进入世界，同是“进入”，情况却大有不同：一是时间不同，前者先于后者。二是方式不同：前者是主动的、强制的，甚至曾凭借武力开道；后者是被动的、缓进的、和平的。三是性质不同：前者是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后者是中国在屈辱中为适应对外关系的新

情况以求自保。世界与中国在 70 年代初步实现互相进入，使中国开始汇入世界发展的洪流，中国开始成为全球性国际社会的一员。这个进程没有到此终结，而是在范围上还要扩大，在程度上还要加深，随之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这不论对中国或者对世界都有重要意义：中国的发展再也离不开世界的影响，而世界则是在增加了中国这样一个很有分量的因素的条件下前进了。

二 近代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的一个直接后果是破坏了中国的独立自主。它们把压迫、掠夺、榨取加在中国身上，使中国背着屈辱之轭进入世界，国家的处境一天天恶化，地位一天天降低。中华民族历尽忧患，几经曲折，才争得国家地位的改善。近代百余年间中国在上地位的变化，从以下几个方面可略见其端绪。

（一）衰落的远东大国

两次鸦片战争，中国被英法打败，造成清朝统治者对西洋强国坚船利炮的畏惧；不仅对西洋大国，而且对以英、法为依托而冀图进入中国的西洋小国也一概屈从。李鸿章的一些话反映了很大一部分清朝当政者的心态。1876 年 7 月他写道：“时势艰难，度支告匱，若与西洋用兵，其祸患更有不可测者。”^① 这里的“西洋”是指英国而言的。1883 年 6 月中法关系紧张，他又写道：“各省海防兵单餉匱，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② 由此看来，清统治者已把中国置于比西洋各国低一等的地位了。

从 70 年代起，与中国同处远东的日本开始迈开向外扩张的脚步，中国是它扩张的一个目标。清政府没有把日本放在眼里，对于与日本抗衡没有犹豫，而且颇有成效：它首先粉碎了日本要订立不平等条约的企图，接着又顶回了日本对台湾南部的武力入侵。经过这两次事件，清政府中有政治眼光的人看到了日本对中国的潜在威胁，开始筹划防御之策：筹办海防，

^① 王彦威编《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卷 6，第 23 页。

^② 吴汝纶编《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 14，第 10 页。以下均简称《译署函稿》。

首要的防范对象是日本，而不是西方各国。当时中国在走近代化之路方面落后于日本，但按实力、按地位，绝不在日本之下，甚至在日本之上。英国为阻挡俄国势力南下太平洋，在远东所依靠的是中国而不是日本。这说明，当中国在欧美资本主义各国面前已是一个被欺负、被贬损的国家时，在远东地区各国中依然保持着大国地位。

中国作为远东大国的地位和作用还表现在对邻国的影响上。由于这些邻国在19世纪同中国一样也遭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与它们之间的传统关系开始受到挑战；但这种关系一般仍继续存在，由此而形成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关系体系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对西方入侵的一种抗衡力量，成为中国与各邻国共同反抗外来侵略的媒介。这表现于这些邻国在遭受侵略时向中国求援、中国给予外交的以至军事的援助，以及外国在侵略这些国家的道路上必须克服中国这个障碍才能达到其目的：日本侵略琉球、朝鲜，法国占有越南，英国吞并缅甸，都有这种情况。这说明中国在远东以至东南亚的国际事务中还有相当影响，说明中国与各邻国的传统关系在抵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又不能产生重大效果，外国资本主义在对华及各邻国的侵略中也在消除中国对那些国家的影响，破坏其相互间的传统关系和那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关系体系。

在这种种方面，甲午中日一战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中国惨败于日本，《马关条约》成立，标志着外国资本主义侵华达到一个新阶段，中国的衰落跌到一个新低点。中国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远东大国的地位为日本所取代。中朝间的传统关系被彻底破坏。而由于在有清一代的中国与邻近国家的传统关系中，中朝间的关系建立最早、基础最牢、相互往来最密、存在时间最久，所以随着这个关系被斩断，原来的那个国际关系体系也就最终瓦解了。

（二）不平等的同盟与无同盟

甲午战争的结局极大地改变了远东的形势。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尽，资本主义列强就在中国展开了激烈的角逐。从这时起的二十余年间，列强侵华高潮迭起，从争夺让与权、夺取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经八国联军侵占京津、日俄在中国领土上进行战争，到日本进军山东、提出“二十一条”要求等等，中国一再面临瓜分之祸，民族危机不绝如缕。这是世界资本主

义发展为帝国主义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列强为重新分割世界而把人类拖入一场战争大浩劫的时代。在走向这场厮杀的进程中，列强间纵横捭阖，分化组合，逐渐形成互相对立的集团。这种集团政治发端于欧洲，扩大延伸到亚洲，把中国直接或间接地卷入了它们斗争的漩涡。在这二十多年间，中国地位的进一步降低表现在许多方面，其中，表现在与资本、帝国主义建立不平等的同盟以及没有同盟者方面就很能说明问题。

中国对日战争失败后，国内出现联俄制日的呼声。俄国利用此形势，于1896年以共同防止日本侵略为饵，诱使清政府与它秘密签订《御敌互相援助条约》。这是历史上中国与外国第一次订立军事同盟。条约中的规定表明，所谓“御敌互相援助”不过是一个漂亮的外壳，里面的实质是俄国单方面在华获得种种特权，最重要的是修筑中东铁路之权。这完全是一个不平等条约，是一个不平等的同盟。

19世纪末年，特别是20世纪初，帝国主义集团政治在争夺中国中起了重要作用。先有法俄同盟，后有英日同盟，经过种种变化，1907年联结成了一个英、法、日、俄集团。这对中国以及对德、美两国的在华活动都有不利之处，于是1907~1908年及1910年两次出现中、德、美三国联盟之议。清政府对此抱有很大期望，先后派唐绍仪、梁敦彦前往美、德首都活动，结果毫无成就，寻找盟国的梦完全破灭。这样，在一个结盟盛行的时代，与日本以一连串盟约、协约、秘密协定而同英、法、俄等欧洲强国联结起来以加强其侵华地位形成鲜明对照，中国成了一个孤零零的、没有同盟者、只有被侵略而得不到真正外来援助的国家。

1918年5月，中日秘密缔结《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及《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所谓“共同防敌”，赋予了这个协定以准军事同盟的性质。协定是日本倡议的，其目的是为它出兵西伯利亚提供便利，并乘机进入中国领土。不久，日军果然进入东三省北部多处地方，这个协定的不平等性就完全表现了出来。

甲午战争以前，中国没有与外国资本主义结盟的问题。1896年第一次发生这个问题，这在一定意义上表明了中国“进入世界”的深化。但是，不论这一次与俄国的正式结盟，或者二十二年后与日本的准军事同盟，在中国近代历史上都是罕见的。这两次事情的主导者都不是中国政府，尽管中国的有关统治者也有自己的目的，但基本上他们都是被对方利用甚至愚弄了，秘密结盟成了对方在中国获取利权、扩大势力的手段。这是帝国主